

不只是延续与保存

——中国民乐界的新探索

一张古琴,其强大的生命,在于经历历代琴人的发展与创新而愈发清亮;一首乐曲,其传世的样态,在于经无数传统的流变更迭而厚重绵长。

中国民乐人孜孜以求的,不是停驻在历史中的古董,而是以发展的眼光,去探寻中国音乐文化精神长河里静水流深的文脉,求索其生生不息的未来。

正在此间举办的第九届华乐论坛上,中国民乐界人士聚焦当前民族音乐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分享学术思想,探讨民族音乐发展大计,探索民族音乐新未来。



民乐时空场里的心灵使命

华乐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是一代代民乐人传承延续的精神家园。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吴玉霞指出,中华优秀的音乐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特质,更有共通、融合的文化魅力,如何继承创新、保持特色,将理论和实践支撑融合,是当下艺术领域重要的学术思考。

“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演进中,每代人都承担着各自的心灵使命,在属于自己的时空场完成香火接续。”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景侠说。

1940年出生在延安鲁艺的李吉提,幼时即受到边区文艺的熏陶。不到7岁又跟随着家人辗转陕西、山西、河北农村,直至1949年春才来到北京。

“我真没想到少年时的农村生活积累在半个世纪后,都能变成一种巨大的能量。”长大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的李吉提说,中国历史的苍凉、厚重,中国式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意蕴,激荡着代际中国人的情感和灵魂。

今天的中国民乐人不仅继承着中华音乐文化优良传统,也不断创作出更多匹配于新时代精神的新作品。

曾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的乔建中,以五十多年的田野经验和理论书写,提出“音乐地理”概念,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与自然、人文、民间民俗等方面联系起来,为理解和阐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辟了新路径。

上海音乐学院博导刘红认为,无数民乐人一生坚守、上下求索,以漫长而持续的研究,映照出中国民间音乐历史长卷,隐含着传统音乐文化及其研究的时代变迁与学术脉络。“他们的个体精神与才情创造在民乐长河里留下永恒的印记。”

“音乐最终要触及和关怀的是第三重世界,即人的心灵世界。”杭州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王旭青说,它不应该被功利所蒙蔽。

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化气量

近半个世纪以来,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者孜孜不倦,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不断观照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拓展民乐研究的宽厚度,凝成鲜明的学术品格与磅礴的文化气量。

吴玉霞说,推动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繁荣,需要有高屋建瓴的艺术站位与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唯此,才能在坚持守正创新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与国际接轨,用国际主流社会更通用的音乐语言和技术讲好中国故事等,也很重要。”李吉提说。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所组织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比赛中,已融入不少外来体裁,诸如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等,表现出华乐发展中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吴玉霞指出,推动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繁荣,需要从乐者与乐曲、理论与实

践、继承与创新、交流与融合、塔基与塔尖等多维度深入研究。

李吉提多年来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对中国音乐结构从古至今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中西音乐比较”视角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特点,推动了中国音乐领域作曲技术理论教学和研究。

在音乐表演听觉审美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是摆在演奏家和评论家面前的双重探讨课题。83岁的刘再生曾任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他认为,作曲家的创作决定着中国音乐的未来,对此我们应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技法的多元化存在。

全球话语体系下的民乐未来

在全球话语体系下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近年来我国音乐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当代的中国音乐学研究,已经在充分国际化的探索中备受世界关注,未来如何在与西方的交融碰撞中进一步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博导、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次炤提出,面对当今学术界跨学科研究,要保持中国音乐理论的学科品格;面对吸收当代西方新兴学科的理论方法,要保持中国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民族的精神支柱,要注重根性文化的教育。”中国音乐学院博导、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筝委员会会长王中山说。

王中山认为,中国音乐学者应该保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从“根”上重视我们民族音乐教育,建立一个平视中西的宏

阔视野。“中西音乐研究不是博弈,而应该寻求一种平衡。”

未来已来,多向度的发展空间,将会推动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产生更丰饶的成果。李景侠认为,在百年难遇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音乐文化生态里,当代民乐人拥有了探索未知,寻找新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高势能的思想聚集才能够生成新时代的文化气象。业界期待,中华音乐的来世世界鸢飞鱼跃,由乎自然。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13日电)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将于18日至20日在银川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飞)10月14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获悉,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宁夏、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12省市(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宁夏文化馆承办的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在银川举办。此次歌会由18支汇集藏、壮、回、苗、彝、白、裕固、蒙古等十余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队,200余名歌手报名参赛。

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是我区协同西部十一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全国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歌会已经创办20多年。

歌会包括开幕式、歌手比赛、惠民演出、闭幕式暨颁奖等板块,分别在宁夏图书馆南广场和光明广场举办,三场歌手比赛分为两场民歌比赛专场和一场原生态比赛专场,所有演出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10月20日至21日,主办方组织获奖歌手及部分省区优秀歌手组成小分队,赴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等开展惠民演出,将歌会成果惠及更多基层群众。组委会将评选出金奖、银奖、铜奖及“民歌传唱特别贡献奖”“民歌传唱新人奖”等奖项。此外,为保证赛事的权威性和公平性,本届歌会将邀请知名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学者等担任专家评委,在历届歌会的基础上对评分方式进行了改革和升级,采取现场打分并充分的办法确定比赛成绩,确保比赛的公开、公平、公正。

本次歌会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0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也是疫情之后宁夏对外展示的一场文化盛宴,通过本次歌会,将进一步提升宁夏对外宣传力,扩大我区文化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从高原走向高峰”艺术讲座在银川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束蓉)10月13日,银川市举办“从高原走向高峰——重大主题创作谈”艺术讲座,邀请国内著名艺术家、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舟作为主讲嘉宾。本次活动由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由自治区图书馆、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和宁夏大象文化传媒公司承办,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共同协办。

据了解,张江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俄罗斯国家艺术学院荣誉院士,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他的画作《热血·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高地》等聚焦重大题材中国人物画创作。讲座现场,张江舟从重大题材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历史与现状、重要特质、存在问题与解决途径、一般性规律、语言与精神的逻辑关系五个方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作了独到的讲解。

记者从银川市文联了解到,根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化改革方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化改革方案》相关要求,银川市文联在建立文艺领军人才、文艺群体拔尖人才、中青年文艺骨干人才库方面发力,加大文艺人才培养力度,落实文艺培训专项经费,打牢银川文艺发展基础。



10月13日,演员在表演原创话剧《老街》。

当日,上海市闵行区颀桥镇戏剧原创话剧《老街》在颀桥镇文体中心展演。话剧《老街》以颀桥老街旧区改造的真实故事为素材,通过百姓视角,讲述当地百姓生活变迁的故事,为社区居民献上文化大餐。
新华社发

内蒙古发现一处辽金时期大型皇家寺院遗址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13日电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在辽上京遗址发现一处辽金时期的大型皇家寺院遗址。这是辽上京内现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寺院。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此次发现的皇家寺院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遗址西南的一处高地上,由门殿、前殿和后殿三个殿址组成院落,四面带有回廊,遗址保存完好。

根据遗址考古试掘,以及分析清理出来的莲花纹石柱础和碾墩等柱网结构,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皇家寺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介绍,新发现的这处寺院遗址规模很大,仅次于辽上京宫城的面积,是辽上京内现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寺院。

发掘还显示,在辽代灭亡后,金代又对寺院进行了二次营建,局部有扩大的倾向。这说明该辽代皇家寺院,到金代还在沿用。

辽上京文献记载,辽朝笃信佛教,在辽上京内有很多寺院。董新林表示,如此大规模地对辽金时期寺院进行发掘尚属首次,可为辽金时期寺院考古提供重要考古资料,为“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重要考古实例。

故宫举办国际学术论坛

多国专家学者共话中国明清史

“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近在北京举行,参会专家学者近200人,收集论文160余篇,涵盖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

故宫博物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现场发布题为《紫禁城与王朝气象》的主题学术报告。

他指出,都城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皇宫是王朝的中枢之地。建宫定都向为国之大政,影响王朝的历史命运。紫禁城肇建于明朝“永乐之治”,定格于清朝“康乾盛世”,紫禁城的历史命运与王朝盛衰密切相关。明成祖朱棣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力排众议,肇建紫禁城迁都北京,从天子戍边这一历史选择,深刻影响明清两朝的历史走向。

他说,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以百余年时长,通过修缮、扩建、添建、重建,翻新旧日的紫禁城宫殿,最终定格今天紫禁城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瑰宝。并借助紫禁城这一宏阔的历史平台,创造出一个个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康乾盛世”,使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据悉,论坛主题涉及明清国家治理、中央与地方、明清文物典藏、宫廷建筑与艺术等方面,海外相关学者以提供论文或视频发言的方式参会。
(据中国新闻网)

◆ 国宝传奇 ◆

钟为何鸣?

——交泰殿大自鸣钟传奇

洪亮的自鸣钟声准时从紫禁城交泰殿传出。

钟声未落,紫禁城租房中的大清高官们纷纷掏出揣在补服中的西洋怀表,校准各自的时间。

早在18世纪前后就开始为紫禁城报时的大自鸣钟,今天仍安放在故宫交泰殿。



大自鸣钟(资料图片)

大自鸣钟所在的交泰殿,得名于“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古老东方智慧。“天地交”催动时间,浩浩荡荡奔涌不屈,意味着进取创新;“万物通”突破空间,取长补短生机勃勃,意味着开放交流。

它的外壳是楼阁型木柜,高5.57米,黑漆描金。背面有一小梯,登上可以去给钟上弦。早在雍正年间,宫中就有按例维修保养这座大钟的规矩。

然而如此大名鼎鼎的宝物,来历却神秘模糊。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嘉庆二年(1797年)交泰殿发生火灾,大自鸣钟被毁。现存这座是嘉庆三年重新按原物重制的。那么问题来了,被烧毁前的大钟是何来历呢?对此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这座大自鸣钟是由清宫造办处学习西方精密机械技术后仿造而成。另一种说法则更有戏剧性,认为这座大自鸣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献给明万历帝的那一座。

但无论是“国产仿制”或是“原装进口”,大钟的身世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它既是科学交流的先驱者又是时代兴替的见证人。而它在不同时代所经受的褒贬态度里,往往藏着历史风向的密码。

允文允武的清圣祖康熙帝,自幼钟爱世界先进科技,自鸣钟也是他的“心头好”。他曾御制《咏自鸣钟》诗:“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清晨勤政务,数回奏章迟。”诗里将自鸣钟这项来自西方的科技,用于监督自己勤政治国,从中不难看出,对康熙帝而言,大自鸣钟是他的“勤政钟”“强国钟”。

而到了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时期,对大自鸣钟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乾隆十年(1745年),大钟虽然仍保持了留置交泰殿的“待遇”,但却添了位新朋友——乾隆帝造办处按近千年前的唐朝技术制作了一尊古代水力计时设备——铜壶滴漏,也放在交泰殿内,与大钟相向而立。

一中一外两尊“時計”同殿而立,本来也算盛事,可乾隆帝命人刻在铜壶滴漏外壁的铭文中却有“较自鸣钟,淫巧徒传”这样对自鸣钟贬斥蔑视的语句。

乾隆帝闭塞自大的态度成为此后百余年里清王朝对世界先进科技、全球文明交流的官方态度。“玩艺”——此后直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使用与认知再未超过这两个字范畴。据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侵略军惊讶地发现,那些乾隆年间来华的外国使团献上的当时最先进枪支弹药与科学设备样品,连外包装都不曾拆开。

大自鸣钟仍在紫禁城里准点报时,满朝文武怀里的表依然走着,精神的钟摆却早已停了。而此后百余年间间的屈辱与苦难,都是一个民族为这停滞付出的代价。

大自鸣钟今天已不再计时,而它所身处的这个国家也早已凭借创新与开放赢得了应有的尊严与安宁。这座传奇的大钟仍默默矗立,提醒人们:不闻“钟声”,炮声不远;交流开放,国泰民安。

这个道理,中西皆然。(据新华社)